

# 東亞雁行結構的調整與變遷

蔡 東 杰\*

## 摘 要

最晚自 1980 年代以來，東亞地區的表現便成為學術與實務界所關切的對象之一。大體而言，他們的觀察焦點主要有二：其一是「奇蹟」的生成原因究竟為何，其次則是東亞的未來及其對世界各地的影響又將如何。其中，所謂「雁行」的相關概念可說是理解上述問題的重要途徑之一。在此，本文亦將依循此一邏輯結構，首先概述東亞奇蹟的發展，特別是它在最近有何變遷跡象，其次則透過對於雁行理論的介紹來說明此一系發展的可能背景，不過，正如許多人所發現的，更重要的還是此種解釋方式所遭遇到的危機與諸多挑戰。因此，最後我們也試圖將目光聚焦在東亞當前所面臨的結構變遷上頭，一方面探討其可能的變數由來，再者也期盼能稍稍勾勒出該區域的未來走向。

關鍵詞：東亞、雁行結構、政府主導工業化、日本、金融危機

---

\*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 壹、東亞地區的奇蹟與危機

自從日本歷經大戰後的重建歷程，在 1960 年代逐漸復甦其經濟，並開始透過政府主導（特別是 MITI）與若干主要大企業進行全球性擴張後，不僅讓它迅速躋身全球七大工業強國（G-7）之林，特別在整個東亞地區，也以日本為首形塑出所謂「雁行模式」（*flying-geese model*）的區域結構態勢，從而將包括四小龍（台灣、南韓、香港、新加坡）與東南亞國家（亦稱「新四小龍」，包括泰國、印尼、馬來西亞與菲律賓等）在內的狹義東亞區域，納進以日本為核心的區域「技術性階層體系」（*technologically hierarchic system*）中。由此，一方面不僅使日本透過跨國部署而建構起其專屬的經濟勢力範圍，同時也使得相關東亞國家得以藉此透過外資引入與技術轉移，強化其「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政策，最後讓東亞（儘管在 1997 年發生金融危機）在 1950-80 年代間締造了一個「奇蹟年代」，並成為 20 世紀末期最受矚目的開發中地區。對此，Ezra Vogel 試圖透過「日本第一」的角度來加以闡釋，認為冷戰所帶來的技術分享、國際貿易擴張、消費成長、資訊革命與跨國公司崛起等因素，特別是第四波工業革命中對於消費性家用電子產品的大量需求，可說是此期間東亞工業化進程得以成功的背景。<sup>1</sup>

當然，注意到東亞表現的並不止 Vogel 等人，例如世界銀行也在 1993 年提出一份名為《東亞奇蹟：經濟成長與公共政策》的專題研究報告，<sup>2</sup>目標是那些「表現優異的亞洲經濟體」（*high-performing Asian Economics, HPAEs*）：包括東北亞的日本、南韓、台灣、香港，與東南亞的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總共是 8 個國家。不過，學界對此份報告的反應可說意見分歧，例如政治經濟學家認為它不夠重視「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現實，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它太過於重視政府介入的角色，<sup>3</sup>至於日本學者青木正彥（*Massahiko Aoki*）等人則傾向於認

---

<sup>1</sup> See Ezra F. Vogel, *Japan as No. 1* (Cambridge, M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and *The Four Little Dragon: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 (Cambridge, M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apter 1.

<sup>2</sup> 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sup>3</sup> Edith Terry, "An East Asian Paradigm?" *Atlantic Economic Journal*, 24:3(1996), pp.1-18.

為，東亞模式走的應該是上述兩者之外的第三條道路。<sup>4</sup>

值得注意的是，負責撰寫報告的 John Page 與 Howard Pack 等特別強調「出口導向」在東亞各國政策中的重要性（儘管日本可能是個例外），並認為共通性在於它們都接受國際價格機制；不過，儘管強大的官僚機制乃是東北亞發展的基礎，世銀並不鼓勵其他國家仿效，因為由此衍生的保護主義使其與先進國家間糾葛不斷，而後者（尤其是美國）乃發展中國家出口市場所繫。<sup>5</sup>更重要的是，雖然世銀希望利用東亞案例提供某種可供發展中國家借鏡的經驗，但顯然偏好相對更具開放性的東南亞模式，甚至嚴詞批判日本對於外資進入的限制；報告中同時指出國際環境變遷的影響，亦即由於 1960-70 年代有利於東北亞出口的優勢已然不再，因此 80 年代東南亞的成長更彌足珍貴。<sup>6</sup>對於大力贊助世銀進行研究，但在最後內容中卻遭到抨擊的日本來說，此結果可說始料未及。對此，長期研究東亞區域發展的 Wade 站在日本這邊，認為這份世銀報告不過是先進國家（以美國利益為主）企圖擴張對發展中世界影響力的打手罷了。<sup>7</sup>

從某個角度看來，世銀報告確實忽略了日本透過 FDI 對此區的影響，特別是在 1985 年「廣場協定」（Plaza Accord）導致日幣升值，並促使日本開始推動結構調整政策後。<sup>8</sup>無論如何，當我們關注二十世紀末東亞的發展時，不由得產生一連串問題，包括：何以一度締造奇蹟的東亞，卻陷入普遍性經濟危機的陰霾當中？曾作為東亞經濟起飛領航者的日本，因何也遭受泡沫化的威脅？這對該國與東亞地區將發生何種影響？再者，當日本與幾個主要東亞國家紛紛面對轉型挑戰時，過去長期的「雁行」結構是否將跟著出現變化？最後，導致這些調整現象的背後原因究竟為何？東亞地區發展的未來又將呈現何種遠景？這些都是本文企圖去進行初步討

<sup>4</sup> See Masahiko Aoki, et al. "Beyond the East Asian Miracle: Introducing the Market Enhancing View," CEPR Publications No. 442 (Palo Alto, CA.: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Stanford University, 1995).

<sup>5</sup> 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Miracle*, pp.324-325.

<sup>6</sup> Ibid, pp.25-45.

<sup>7</sup> Robert Wade, "Japan, the World Bank, and the Art of Paradigm Maintenance: the East Asian Miracle in Political Perspective," *New Left Review*, 217(1996), p.4.

<sup>8</sup> Toru Yanagihara, "Outlin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Zone, and its Relations with Latin America," discussion paper prepared for the Japan-Mexico Commission for the 21th Century, November 1-2, 1991.

論的目標。

## 貳、雁行理論的基本概念

對日本政府與許多學者來說，所謂「東亞奇蹟」不過是日本成功經驗的擴大版而已；據此，東亞國家學習日本經驗正如當年日本學習英國工業經驗般，都是理所當然的，至於體系的趨同化與國際結構的自然階層化，則是兩個必然出現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看法並不完全是歸納事實經驗所得出的，部分可說是有意識理論與政策主導下的結果，亦即所謂「雁行」理論。<sup>9</sup>

此種理論的最初倡者赤松要（Kaname Akamatsu）強調，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長與產業結構變遷過程時，絕不能忽視它們與先進國家間的彼此互動發展；接著，他從出口導向政策出發，得出以下推論：「在後進國家 A 開始其追趕過程後，領先國家 B 也相對出現衰退跡象，當 A 占有 B 國市場後，其發展也達到某種高峰」。<sup>10</sup>他同時將這種具備階層性特徵的發展稱為「雁行」（flying geese）發展模式。事實上，這種「進口-國產化-出口」（M-P-E）過程也就是後來所謂「進口替代+出口擴張」模式，只不過更重視先進者與追趕者之間的「教導-學習」互動過程，並強調結構中不同階層間的可流動性。從某個角度看來，赤松要的理論非常簡單，亦即一個後進國家先從先進國家輸入貨物，然後開始設法自己製造貨物，甚至利用其比較優勢將這些貨物出口到先進國家中，一旦其出口品從非耐久財、耐久財，最後升高到資本財，便可說跨進了已開發國家門檻，至於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會隨著仿效整個過程；換言之，這個過程絕非是低水準程度的一再重覆，而是種螺旋式的上升進程。<sup>11</sup>

在此種理論的運用過程中，有三個關鍵是必須注意的：首先是「政府」扮演

---

<sup>9</sup> 儘管此種理論經常被用以說明區域性（特別是東亞）發展歷程，但事實上相關政策還受制於客觀的市場環境；例如就全球來看，日本其實只是美國所帶領雁群的一部分，只不過它自己也間接帶領著另一個雁群，更甚者，美國過去一度也只是從屬於英國的次雁群領袖。

<sup>10</sup> Kaname Akamatsu, "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Developing Economics*, 1(1962), pp.1-23.

<sup>11</sup> 樊勇明、談春蘭，《日本的大國夢》（香港：三聯書店，1993年），頁150-154。

的角色，無論是提出國家長程規劃（例如1930年代日本「大東亞共榮圈」區域主張）或扮演擊畫與主導者（例如戰後日本重建資本密集重工業的過程），正如 Stiglitz 所言：「那些經濟成功的國家不僅從未遵守過所謂華盛頓共識（亦即政府鬆綁與自由化），其成功也正因為它們沒有遵守該共識。」<sup>12</sup>此外，前述世銀報告其實也某種程度地肯定了東亞政府所扮演的經濟發展推手角色。

其次是「競爭」的概念（儘管赤松要對此並未完全闡明）。<sup>13</sup>同樣以日本的發展為例，該國所採用的發展戰略基本上符合赤松要提出的三個連續模式，首先是「M-P-E」進步擴張過程，亦即進口替代加出口擴張（IS-EP），第二是「由簡入繁」的漸進升級過程，亦即將主產品由低附加價值往高附加價值逐步發展的工業升級（IU）過程，第三則是「不同發展程度國家間的合作」，亦即在鄰近的亞洲開發中國家間，根據彼此的比較優勢組成一定程度的合作關係。其中，所有結構內國家都該根據先天稟賦與後天努力，儘可能爭取較優越的地位。

最後，「工業升級」顯然是雁行理論的目標。特別是對備受追趕壓力的領先者來說，一旦優勢不再，便必須設法透過國際投資來刺激進步並維繫地位。所謂優勢不只涉及靜態的「分配性效率」（各自的產品內容），還包括動態的「適應性效率」（產品內容可能變動）。更甚者，在比較利益法則前提下，透過 FDI 所進行的工業升級政策其實可說是理論的修正版。<sup>14</sup>在此情況下，工業升級將隨著以下五個階段前進：<sup>15</sup>首先是所謂「赫克爾－歐林式」（Heckscher-Ohlin）產業，亦即根據自我要素稟賦（資源或廉價勞力）以勞力密集性輕工業（例如紡織業）為主的階段；其次是「無區隔的亞當斯密式」（nondifferentiated Smithian）產業，亦即建立以規模經濟為主的鋼鐵、基礎石化與合成纖維產業，在此，國家將重視並鞏固原料來源與可供銷售的市場；第三是「區隔性亞當斯密式」（differentiated Smithian）產業：亦即朝向如汽車與電子（電視）業等消費性耐久財的大規模組裝生產邁進，福特式生產

<sup>12</sup> 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W. Norton, 2002), p.201.

<sup>13</sup> Pekka Korhonen, *Japan and the Pacific Free Trade Area* (London: Routledge, 1994).

<sup>14</sup> Terutomo Ozaw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Japan as a Recycler of Market and Industry," *Business & the Contemporary World*, 5:2(1993), pp.129-149.

<sup>15</sup> Terutomo Ozawa, "The 'Hidden' Side of the 'Flying-geese' Catch-up Model: Japan's derigiste Institutional Setup and a Deepening Financial Morass," drafted when Ozawa was a visiting fellow at the East-West Center, Hawaii, July 2001.

線與泰勒式科學管理都是此時期特色；接著是「熊彼得式」(Schumpeterian)產業，亦即著重於新一代電子產品、新材料、生化技術與新元件研發(R&D)工作，這也是所謂的「實驗室時代」；<sup>16</sup>最後則是「麥克魯漢式」(McLuhan)產業部門，亦即朝向以網際網路與資訊科技為主的尖端產業邁進。由此，所謂「新經濟」(New Economy)也跟著來臨了。<sup>17</sup>

雁行理論雖看似是個源自日本的概念，其實 Schumpeter 早在赤松要之前便指出，工業升級不僅有賴創新，並必須依不同結構位置循序漸進，同時需要某個特定附加價值部門牽引，<sup>18</sup>而 Clark 也強調，經濟發展有賴於第二與第三部門的漸次興起與取代前一個部門；<sup>19</sup>這些都是與其相近的概念。至於 Vernon 也針對各國的貿易與投資發展，提出所謂產品週期理論；他認為先進國家由於龐大的國內市場需求，因此在創新產品與生產過程上具有比較優勢，甚至有餘力將生產剩餘外銷到其他國家，但隨著國際競爭日趨激烈與國內生產結構的轉型，再加上生產過程的標準化，最後將導致這些企業建立海外分支機構，並將製造中心透過海外投資移到勞力成本較低廉的地區去。<sup>20</sup>進一步來說，相對於赤松要從發展中國家角度來觀察其產業結構變化，Vernon 從已開發國家切入的觀點，可說恰與前者形成一種互補狀態。

### 參、日本經濟擴張與東亞經濟起飛

作為雁群的帶領者，日本的經濟擴張可說是整個東亞結構成形之所繫；從這個角度來看，日本一開始便以「市場導向」為目標。<sup>21</sup>在經濟帝國主義所強調的垂直

---

<sup>16</sup> See Michael H. Best, *The New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Renewal of American Indust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sup>17</sup> 亦即要求更開放的市場環境，參考 William Baumol, *The Free-Market Innovation Machine: Analyzing the Growth Miracle of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sup>18</sup> See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sup>19</sup> Colin Clark,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London: Macmillan, 1935).

<sup>20</sup> Raymond Vern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0:2(1966), pp.190-207, and "The Product Cycle Hypothesis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Statistics*, 41:4(1979), pp.21-40.

<sup>21</sup> Masahiko Aoki, Kevin Murdock, and Masahiro Okuno-Fujiwara, "Beyond the East Asian Miracle:

分工與 Ricardo 從比較利益角度強調的水平分工間，日本認為後者只能存在於程度相當的國家間，甚至比較利益已決定了各國在垂直結構中的位階；這意味著日本自始便選定帝國主義式的發展方向，至於其「自然的」勢力範圍，以冷戰環境言則是東南亞地區。事實上當赤松要進一步推敲其理論時，同時也為日本的東南亞政策奠下基礎；其後在美國的支持與引誘下，日本在 1950 年代透過戰爭賠款、外援與投資等途徑，開始陸續將工業推向東南亞，以取代原先與中國大陸間的關係。<sup>22</sup>而日本的企業也支持這樣的擴張行動。

在此，起田三郎 (Saburo Okita) 可說是影響日本東南亞政策的最主要人物之一。他曾在池田勇人首相期間擔任日本經濟計畫署長官，並帶領 2000 名政府官員與學者，共同推動 1960 年著名的「國民收入倍增計畫」，其後又於 1979-80 年間擔任外交部長。起田不僅非常支持雁行理論，赤松要和他的學生（同時也是國際經濟學家的）小島清 (Kiyoshi Kojima) 也曾參與前述計畫。總之，起田一方面促使雁行理論成為東亞區域整合的基礎，也推動了 APEC 機制的出現。<sup>23</sup>其實早在 1965 年，小島清便建議在東亞根據發展程度，成立兩個相互關連的自由貿易區；其後當日本在 1995 年成為 APEC 東道主時，更企圖挑戰美國霸權，提出「區域合作」口號，而日本的國際合作署也不斷提供基金贊助該區域的人力資源發展。

在 1950-71 年間的戰後重建黃金時期中，日本的國民平均所得非但成長了 6 倍以上，相對於西歐 4% 的年成長率，日本則為 8%，此外，日本為 7.7% 的製造力年成長率，也凌駕在西歐的 4.8% 之上；至於其總要素生產力也以每年 5.1% 的速度不斷成長。<sup>24</sup>這種優異的經濟表現，當然也構成日本向東南亞地區擴張以建立雁行結構的基礎。從理論面來看，雁行學說雖未直接定義日本與亞洲各國間的關係，但它的確支配了日本官商對此區域的擴張態度，終於使東亞在 1991 年取代美國，成為

---

Introducing the Market-enhancing View," in Masahiko Aoki, et al. eds.,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pp.1-40.

<sup>22</sup> Yoshihide Soeya, "Japan's Policy towards Southeast Asia," in Chandran Jeshurun, ed. *China, India, Japan and the Security of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93).

<sup>23</sup> Saburo Okita, "Pacific Developm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World Economy," in Saburo Okita, ed., *Japan in the World Economy of the 1980s*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9), pp.208-209.

<sup>24</sup>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ris: OECD, 2001), p.139.

日本首要出口對象，在 1993 年更超越美國成爲日本貿易盈餘主要來源；<sup>25</sup>其後到了 1995 年，日本對中國與四小龍共出口 1865 億美元，進口 1155 億美元，同年對美國出口爲 1209 億美元，進口則爲 754 億美元，可見東亞與美國對日本的貿易意義正出現此消彼長的態勢。<sup>26</sup>

從東亞的發展歷程來看，儘管後進經濟體的成功還是根源自它們各自的國內條件，以及採取了對外導向性發展策略，日本在其工業化過程中仍確實扮演了帶領者的角色；<sup>27</sup>作爲貿易夥伴，後者積極提供了投資援助並帶來先進技術。更重要的是，日本在提供資金、技術與中間財方面，遠大於其所扮演的消費性市場角色，這與歐美所代表的意義是大不相同的。更甚者，相對於銷往日本佔東亞國家出口比例從 1980 年的 22% 降到 1994 年的 12.6%，銷往東亞國家佔日本出口比例卻從 25% 升高爲 38.7%，其關係可見一斑，至於美國則始終消費著東亞出口量的 40% 以上。事實上，美國的資本主義霸權角色，可說在東亞奇蹟過程中扮演重要的地位；原因是美國創造並維持了一個有利於國際貿易的環境，正如英國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所扮演者一樣。<sup>28</sup>由於霸權國家將提供了此種「搭便車」的機會，其結果不僅促使某種階層性依序升級現象，也爲「雁行結構」的搭造提供關鍵性的環境條件。

根據雁行模式的指導或暗示，日本、四小龍（NIEs）、東協（ASEAN）國家與中國大陸，將依序根據其比較利益與發展程度組成某種階層性結構，其中 FDI 將由較先進國家流向追趕中國家，以促進後者的工業升級。此種概念原先只是被用以瞭解特定國家中特定產業部門的生產週期，<sup>29</sup>後來則被用以形容區域性發展的動態過程，例如東亞各國在從紡織業、化學工業、鋼鐵業、汽車工業到電子業的生產重心挪移過程中，便出現此種依序升級的特徵。進言之，底層國家生產勞力與資源密集產品，而頂層國家則生產資本與技術密集的產品，然後隨進步依序往前挪動；

---

<sup>25</sup> Jonathan Friedland, "The Regional Challeng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ne 9, 1994, p.40.

<sup>26</sup>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如此，日本在東南亞並不居於主導地位，例如四小龍（NIEs）對東南亞的總投資額就超過了日本與美國。

<sup>27</sup> Chung H. Lee, "Japan and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ost-'Miracle' Era," The European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44, June 1998.

<sup>28</sup> Terutomo Ozawa, "Toward a Theory of Hegemon-led Macro-clustering," in Peter Gray, ed. *Extending the Eclectic Paradigm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heltenham, Glos.: Edward Elgar, 2003), pp.201-225.

<sup>29</sup> Kaname Akamatsu, "Trend of Japan's Wooden Product Industry," *Journal of Nagoya Higher Commercial School*, 13(1935), pp.129-212.



例如當日本在 1970 年代跨足高科技部門後，南韓與台灣便承接日本原先在紡織業的角色，隨著後者也進入電子部門，東南亞國家則接著承接下紡織部門。雖然東亞發展經驗未必如雁行模式所解釋般簡單，<sup>30</sup>一定程度的國際分工仍使東亞各國在較有秩序的情況下，避免了直接競爭的衝突。再者，它們也利用已開發國家戰後的高成長率，相較於專注進口替代的國家，享受了部分「先期出口者」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當東亞朝向工業升級的第三階段，亦即消費性耐久財組裝產業邁進時，它們對零組件技術供應者（尤其是日本）的依賴性也會相對提高；<sup>31</sup>這也反映在東亞各國大多對美國享有貿易盈餘，對日本卻存在著巨額赤字的特殊現象上頭。<sup>32</sup>由此看來，東亞國家的發展不僅具出口導向特徵，也受到進口政策驅動，亦即必須輸入各式各樣技術與資本財來刺激成長，不過，以各國發展初期的財務困窘看來，此種輸入又必然以外國直接投資為基礎；<sup>33</sup>這不僅凸顯出日本對東亞國家的重要性，其中意涵的雙重依賴現象更可謂雁行結構的特徵。

#### 肆、雁行模式下的日本經濟下坡

東亞地區在第二次大戰結束迄今，一共發生過三次經濟奇蹟：<sup>34</sup>首先是日本的成功完成戰後復興，其後隨著日本出現階段性結構變遷，而其夕陽產業也隨著 FDI 而轉移至鄰近的亞洲國家，<sup>35</sup>以四小龍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NIEs）與中國大陸乃

<sup>30</sup> C. Reynolds, "A Conceptual Model of Global Business Growth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6:1(2001), pp.76-98.

<sup>31</sup> Yung Chul Park and Won Am Park, "Changing Japanese Trade Patterns and the East Asia NICs," in Paul Krugman, ed., *Trade with Japan: Has the Door Opened Wide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1), p.93.

<sup>32</sup> Lester C. Thurow,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How Today's Economic Forces Shape Tomorrow's World*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96), p.207.

<sup>33</sup> Manorijan Dutta, "The Euro Revolutio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Monetary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1(2000), pp.65-88.

<sup>34</sup> Terutomo Ozawa, "Pax-American-led Macro-Clustering and Flying-Geese-Style Catch-up in East Asia: Mechanisms of Regionalized Endogenous Growth," presented at the 24<sup>th</sup> ACA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May 27-29, 2002.

<sup>35</sup> Kojima Kiyoshi and Terutomo Ozawa, "Micro- and Macro-economic Models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Economics*, 25:1(1984), pp.1-20; Terutomo Ozawa, "The Flying-geese Paradigm: Toward a co-evolutionary Theory of MNC-assisted Growth," in Khosrow Fatemi, ed. *The New*

相繼締造了奇蹟。值得關注的是，儘管日本在雁行追趕策略協助下得以與美歐並駕齊驅，何以該國的經濟又會陷入泡沫困境？對此，正如 Mandel 所指出的，世界經濟發展至今（特別在所謂新經濟時代來臨後），整個經濟的發展重心已經從製造面轉向了財務面，「如果科技是新經濟引擎的話，那麼財務便是它的燃料」。<sup>36</sup>小澤（Terutomo Ozawa）認為，雁行政策的問題可能出在與其相搭配的制度（尤其是財政結構）上；而小島清也曾指出雁行模式的不完整性，特別是在財政方面。<sup>37</sup>

正如 North 所言，每個經濟體都有它自己的一套經濟活動制度，而這套制度也決定（促進或阻礙）了該經濟體的發展過程。<sup>38</sup>以日本來說，其雁行追趕機制可說由四個基本要素所組成，亦即：（1）由政府支撐的銀行財務體系與受壓抑的資本市場；（2）財閥模式與交叉持股的影響；（3）內部依賴性產業部門與政治保護措施；（4）工作優於效率原則的社會契約概念。這些要素都對日本當前的經濟危機有所影響，從而導致制度解體的結果。

首先在銀行體系與資本市場方面，日本雖然也以中央銀行而非海外借貸作為經濟發展的財務基礎，這原本便是雁行戰略成功的要素之一，但卻也是其最終面臨危機的原因。為滿足企業的借貸需求，於是政府長期採取低利政策，並優先支持那些配合國家政策發展的項目。在日本銀行（中央銀行）的監督下，幾家主要的財閥銀行（包括三井、三菱與住友等）共同扮演「主要銀行」的角色，帶領各集團專注於特定工業部門；這些銀行雖以強大的資訊蒐集與管理顧問能力而有效降低了風險，但也隱藏著內線交易等不透明問題。<sup>39</sup>隨著經濟成長與儲蓄率的直線上升，政府雖維持著大體平衡的預算制度，使日本並未爆發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但某種「道德風險」（moral hazard）還是存在，亦即在大財閥仗恃政府支持而進行冒險性投資，

---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ism, Regionalism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New York: Pergamon, 2000), pp.209-223.

<sup>36</sup> See Michael Mandel, *The Coming Internet Depress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sup>37</sup> Kojima Kiyoshi, "The Flying-geese Model of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Origin, Theoretical Extensions, and Regional Policy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1(2000), pp.375-401.

<sup>38</sup> Douglas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pter 1.

<sup>39</sup> Hugh Patrick, "The Relevance of Japanese Finance and Its Main Bank System," in Masahiko Aoki and Hugh Patrick, eds. *The Japanese Main Bank System: Its Relevance for Developing and Transforming Econom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59.

與中央銀行不斷投入資本抑制通膨間存在著緊張關係。小澤將此特稱為「社會正義性」的道德風險。<sup>40</sup>

無論如何，此種操控性的資本主義將削弱銀行本身的彈性。特別是日本經濟發展因 1974 年第一次石油危機而趨緩後，一方面貸款需求開始降低，其次，非出自舊財閥體系的新興汽車工業（例如豐田或本田企業）則秉持低債務政策，再加上 1985 年廣場協定導致日圓大幅升值（儘管日本早在 1973 年便放棄了固定匯率政策），熱錢充斥的結果使銀行貸款對象不得不從大企業轉向不動產公司（佔總貸款額四分之一）等中小型的企業。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正義性」道德風險於是開始轉向「變質性」道德風險：在股市於 1989 年底飆到最高點後，經濟泡沫在 1990 年初開始破滅，首先是都市地價下跌，其次是貼現率不斷升高，最後在呆帳率持續變壞的情況下，銀行危機也無可避免地出現了。

其次在財閥（keiretsu）結構的影響方面，由於主要銀行體系都是以財閥模式組成，不僅強調內部的集體合作，也重視財閥與政府在工業發展過程中的互動關係。從某方面來說，此模式可有效降低大規模投資項目的「協調風險」，而交叉持股不僅可增加銀行的操控力，也提升用以建立長期關係的互信程度。一般來說，大約有 10-25% 的股份會由財團內部其他公司所持有。財閥模式與交叉持股既使銀行過度介入非財務部門，也導致銀行數量的過度膨脹，前者最後帶來通貨緊縮，後者則降低了銀行的獲利率。至於政府的介入更使日本經濟被稱為「夥伴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亦即銀行體系對政策的配合度極高，這些都埋下了許多不理性的經濟因素。

第三，在內部保護主義方面，日本對於其剛起步產業的保護相當成功。對此除配合出口擴張政策外，同時也訴諸實際的保護政策：例如對外導向部門（以汽車與電子工業為代表）受到通產省的監督，而內部依賴部門（以農漁業與服務業為代表）的監督職權則分布於農林水產省、郵政省、運輸省、建設省與大藏省等對內部門。正如 Chalmers Johnson 的看法，這些在 1868 年明治維新後產生的新部門與其說是

---

<sup>40</sup> Terutomo Ozawa, "Bank Loan Capitalism and Financial Crisis: Japanese and Korean Experience," in Alan Ragman and Gavin Boyd, eds., *Deepening Integration in the Pacific Economies: Corporate Alliance, Contestable Markets and Free Trad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1999), pp.214-248.

公務人員，還不如說是負責發展任務的各個分工部門，目的都是協助日本迅速追趕上西方的帝國主義國家。<sup>41</sup>其中，對外導向部門隨即成爲該國雁行戰略的扶植重點，保護國內汽車市場更爲顯著例證。<sup>42</sup>但結果卻導致進口行爲無法對內部價格產生平衡效果(原因之一也包括自民黨爲維繫長期執政基礎而被迫保護其不具競爭力的產業的緣故)，由此也埋下一旦開放便將隨之爆發的結構性危機。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對外導向與內部依賴部門並未完全分離，例如以外銷爲主的汽車工業同時也有其國內的零件製造網。由於在主要市場(歐美)內部建立了組裝基地，日本因此可大量輸出零件並累積巨額貿易盈餘，但在此同時，受到保護的國內部門仍繼續阻礙進口，由此進一步促使日圓升值並深化了價格失衡。在此情況下，由於升值的日圓削弱了對外部門的國際競爭力，使財閥們不得不將若干標準化的零件，透過 FDI 形式交給亞洲各國廉價的代工廠來製造，然後再進口回來組裝。此種外匯的「價格扭曲」效果讓日本的 FDI 在 1985-96 年間大幅上升，這一方面意味著該國已晉升高成本國家，同時也帶動日本企業的外移浪潮，從而使產業空洞化與失業率飆漲成爲其發展隱憂(處於雁行結構中層的新興經濟體也出現類似的問題)。<sup>43</sup>

最後在工作契約概念方面，儘管日本在戰後初期曾爆發短暫的勞工運動，但隨即建立了被尾崎(Robert S. Ozaki)稱之爲「人性資本主義」或「人性化企業體系」的和諧勞資關係架構，<sup>44</sup>佐佐木(Eisuke Sasakibara)也認爲，「人性本位可說是日本式混合經濟的基本原則」；<sup>45</sup>至於終身僱傭制與資深制則爲其重要特徵。當然，在亟需展開重建工作的日本戰後初期，此種勞資合作關係顯然來自於生存要求，而非只是選項之一而已。不過，不像美國社會的充滿個人主義，日本的社會與企業家

---

<sup>41</sup> See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7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sup>42</sup> See James P. Womack, Daniel T. Jones and Daniel Roos, *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1990) .

<sup>43</sup>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Agency, *White Paper o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Tokyo: Ministry of Finance Printing Office, 1996) , p.268.

<sup>44</sup> Robert S. Ozaki, *Human Capitalism: the Japanese Enterprise System as World Model* (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1991) .

<sup>45</sup> Eisuke Sasakibara, *Beyond Capitalism: the Japanese Model of Market Economic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3) , p.4.

傳統上還是比較傾向平等主義，這也使其經濟發展有著「保管模式」(stakeholder model)的特色，並在世界銀行試圖解釋東亞奇蹟時，被稱為是一種「分享式的成長」(shared growth)模式。所謂豐田主義(Toyotism)並不像福特主義(Fordism)般，將顧傭者僅視為服從命令的「體力勞工」，而是將其視為「腦力勞工」。從正面發展來看，正如青木正彥所言，此種現象可說是靈活運用勞工們「資料處理能力」的結果；<sup>46</sup>但從相反角度視之，此種信念卻也導致政府無法忽視勞工地位，從而拖緩了制度改革的進程。

### 伍、中國崛起、金融危機與東亞體系調整

無論如何，過去曾帶動東亞經濟起飛的雁行模式，自1980年代起似乎已開始出現結構性的鬆動與變化。表面上看來，其原因包括以下幾項：<sup>47</sup>(1)由於經濟成長與出口趨緩，導致東亞各國的平均所得也停止成長；(2)日圓匯率的變動連帶導致東亞各國匯率也趨於不穩，由此不僅打亂許多長期投資計畫，也影響各國的分工狀態(貨幣升值間接促使日本對外投資額在1986-89年間呈現大幅成長，甚至在1989年以675億美元成為全球對外最大投資國家，<sup>48</sup>其主要目標原本是東協國家，但在1990年代初轉而進入中國，這使得中國大陸得以威脅那些以勞力密集產業為主的東亞國家)<sup>49</sup>；(3)最後，在區域內居於中層的國家不僅彼此競爭激烈，甚至開始威脅日本企業，例如南韓與台灣都藉由對美國的大量貿易盈餘來彌補對日赤字，並逐步將製造基地移至東南亞與中國大陸，<sup>50</sup>由此更進一步打亂原先結構中的國際分工現狀；更甚者，由於中國大陸在低成本勞力密集部門方面的比較優勢，也

<sup>46</sup> Masahiko Aoki, *Information, Incentives, and Bargaining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sup>47</sup> Korkuta A. Erturk, "Overcapacity and the East Asia Crisis,"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24:2(2001-02), p.262.

<sup>48</sup> See T. Bayoumi and G. Lipworth,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Regional Trade," IMF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D.C., 1997.

<sup>49</sup> D.W. Edgington and R. Hayte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Flying Geese Model: Japanese Electronics Firms in Asia-Pacific,"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32:2(2001), pp.281-304.

<sup>50</sup> W. Bello, "East Asia: On the Eve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5:3(1998), pp.424-444.

促使位於第三階的東南亞國家被迫戰略性地往更技術密集的產業發展，從而導致技術密集產品佔東亞國家出口比例在 1990-96 年間出現長足進展。

不過，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可發現東亞體系結構的變遷其實來自三個更宏觀的原因：首先是如前段所言，亦即體系領航者（日本）出現衰退或至少是停滯跡象，其次是東亞傳統強權（中國）再度崛起所產生的挑戰態勢，最後則是 1997 年金融危機前因後果所帶來的深層影響。

在中國崛起方面，由於大陸在 1970 年代末開始推動改革開放運動，使其平均經濟成長率從 1970 年代的 6.5% 升高到 80 年代的 10% 以上，從而讓該國躋身新興經濟體之林；於此同時，隨著其進出口額的快速增長，它也開始在世界經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據估計，如果趨勢不變的話，中國佔全球貿易比重將由 1990 年的 1.7% 升高至 2010 年的 6.6%。<sup>51</sup>儘管人民幣在 1994 年的貶值未必直接導致 1997 年的金融風暴，但中國勞力密集產業的快速發展，加上鄰近國家人力成本的升高，不啻在其出口增加之餘帶來排擠效應。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發展道路顯然與其他經濟體不同：由於擁有大量低教育程度人口，使其獲得長期的勞力密集比較優勢，但同時也因為其龐大的人口，它也可以訓練出足夠數量的技術性勞工投入高科技產業，這不僅讓中國的發展具有雙元特徵，部分學者更認為，中國將無可避免地成為某種「全面性」權力國家，<sup>52</sup>其結果或許是使長期被用以解釋東亞發展活力的雁行理論無法繼續適用。<sup>53</sup>換言之，日本在這種情況下是否能繼續扮演東亞雁行結構的領先者，以及中國是否將取代日本的角色地位等，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實際上，在日本已經有許多人將中國視為強大的國際競爭對手與主要貿易威脅來源；他們認為，中國在東亞的崛起已經打亂了本來由日本帶領之有秩序的雁行結構，其結果是原先根據發展程度而形成的國際勞務分工，將被迫趨向更激烈的產業

---

<sup>51</sup> Ross Garnaut and Yiping Huang, "China and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in *China and East Asia Trade Policy*, Pacific Economic Papers, No. 250, Australia-Japan Research Center,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December 1995.

<sup>52</sup> Yoichi Funabashi, Michael Oksenberg, and Heinrich Weiss, "An Emerging China in a World of Interdependence," Report to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No. 45, May 1994.

<sup>53</sup> Chi Hung Kwan, "The Rise of China and Asia's Flying-geese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US Import Statistics," 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NPI) Papers, No. 52, August 1, 2002.

競爭，特別是在高科技產業部門。<sup>54</sup>進一步來說，在四小龍與中國的夾擊下，東亞地區原來的「技術性階層體系」特徵，已逐漸出現朝「平行性整合體系」(parallel integration system)發展的跡象，亦即日本雖仍在許多技術層面居於領先地位，但已優勢不再。

一般認為，高附加價值與低附加價值的產品，應該分別自高所得與低所得國家出口。由此來看，東亞國家間的出口結構差異依然跟過去相差不多，亦即維持日本居首，四小龍與東協國家其次，中國大陸排在陣尾的典型雁行模式；但若以中日兩國銷往美國市場的產品來做比較（以2000年數據為準），可發現它們在16.3%的產品上處於彼此競爭的狀態。<sup>55</sup>例如在IT產業方面，美國在1990年共進口762億美元的相關產品，至2000年增至2529億美元，其中不但有三分之二來自東亞國家，其中日本產品由282億增至443億，而中國產品更由15億增至261億。當然，日本產品比例的下降，部分是因為產業外移或採取代工模式的關係，若計入這些隱形因素的話，日本的經濟力量仍不容小覷。亦即儘管中國確實展現強勁的追趕力道，但目前仍受到雁行結構的制約。

至於在金融危機的影響方面，有人認為1997年的東亞危機代表著東亞式資本主義的終結，有人則認為它乃是全球財務市場缺乏有效調節下的後遺症；就前者而言，由於政府過度介入導致的道德風險乃危機爆發主因，但後者認為，危機爆發的原因其實是投資者不理性群聚下的結果。<sup>56</sup>對於危機源起的主流觀點源自Paul Krugman，亦即在外匯有限的情況下因政府過度支出所導致：<sup>57</sup>由於資金緊繃，國內利率隨著升高，為解決問題，政府只好增加貨幣供給量，結果導致實質利率降低，而市場上囤積搶購風潮也跟著爆發出來，這正是1980年代拉丁美洲危機的實況。<sup>58</sup>

---

<sup>54</sup> JETRO, *White Paper on International Trade* (Tokyo: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2001) .

<sup>55</sup> Chi Hung Kwan, "The Rise of China and Asia's Flying-geese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US Import Statistics," p.6.

<sup>56</sup> L. Taylor, "Capital Market Crises: Liberalization, Fixed Exchange Rates and Market Driven Destabilizat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2:6(1998), pp.663-676.

<sup>57</sup> Paul Krugman, "A Model of Balance of Payments Crise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1:3(1979), pp.311-325, and "Crises: The Price of Globalization?" symposium sponsor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Jackson Hole, Wyoming, Aug. 24-26, 2000.

<sup>58</sup> C.A. Rodriguez, "The Argentine Stabilization Plan of December 20th," *World Development*, 10:9(1982), pp.801-811.

但東亞既未出現鬆散財務政策與過度消費擴張現象，甚至沒有政府在危機前面臨著嚴重的赤字問題；儘管如此，Krugman 依舊認為，由於東亞政府過度介入所帶來的道德風險，仍誤導私人部門與外國企業進行不理性投資，從而造成泡沫現象。<sup>59</sup>

當然，前述解釋東亞所以爆發危機的原因（特別是政府介入），其實也可以用來說明其經濟發展何以獲得成功。<sup>60</sup>因此在主流觀點外，另一派學者認為危機爆發的原因可能來自所謂東亞發展模式（政府控制外債與協調私人投資）因自由化浪潮崩解的結果。<sup>61</sup>儘管有人認為，過度依賴出口將導致貿易與國民所得惡化，<sup>62</sup>但在 1980 年代中期前，區域勞務分工卻使東亞得以免於此種困境。無論如何，儘管東亞地區已經從這場風暴中逐步復甦過來，而所謂雁行結構也似乎還沒有出現明顯的解構性發展，但危機的爆發及其所帶來的自由化壓力，仍勢將在衝擊東亞發展模式核心（亦即政府主導角色）之餘，留下更多的不確定變數。

## 陸、結論

正如前述，由於日本經濟在 1980 年代末遭受「泡沫化」的打擊，而原來位居體系中層的四小龍國家也分別根據其比較利益，配合政府與企業政策而大幅提昇國際競爭力，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表現自 1990 年代起的愈發受到全球重視，於是使東亞原來的「技術性階層體系」特徵，漸漸出現轉而朝向「平行性整合體系」發展的跡象，換言之，東亞發展似乎已因此進入所謂的「後雁行時期」(Post-flying-geese Era)。至於由此導引出的新議題重點大多集中於：日本危機的深化程度及其對區域發展的影響、東亞發展體系模式的質變與轉型，以及重新檢討日本對於東亞發展所扮演的角色……等。儘管東亞體系的重組已露出端倪，但未來重心與特徵則仍屬未

---

<sup>59</sup> Paul Krugman, "The Myth of Asia," *Foreign Affairs*, 73:6(1994), pp.62-78, and "What happened to Asia?" MIT, Economics Department, Mimeo. [www.mit.edu/krugman/www/disinter.html](http://www.mit.edu/krugman/www/disinter.html), 1998.

<sup>60</sup> A. Singh and B. Weisse, "The Asian Model: A Crises Foretold?"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51:1(1999), pp.203-215.

<sup>61</sup> H. Chang, "Korea: A Misunderstood Crisis," *World Development*, 26:8(1998), pp.1555-1561.

<sup>62</sup> See Raul Prebis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50), and H.W. Singer, "The Distribution of Gains between Investing and Borrowing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0:2(1950), pp.473-485.



定。

儘管如此，所謂「雁行理論」的相關研究並不因此而失去價值。此種起自 1930 年代日本學者赤松要的經濟學說，目的是透過國際分工法則的研究，為日本提供發展政策參考。其後，儘管日本在戰爭復甦後逐漸將這套模式落實到它與其他東亞國家的經濟互動關係中，但相關學術研究卻一直要等到 1970 年代，亦即日本鞏固其國際經濟地位後，才陸續被引介到國際學術界中，成為人們理解東亞區域發展的一種重要解釋途徑。正如赤松要所強調的，在一個區域性國際體系裡頭，由於有著發展的共同意識與目標，因此可分成「領導」與「追隨」兩個具次序性的群體；當然，國家間的相對位置並非是一成不變的，一旦追隨者的發展速度與程度超過領先的國家，後者的領導位置便可能遭到根本性的取代。從這個角度來看，或許東亞今天所面臨的並非「體系結構變遷」問題，而僅是個「體系次序重構」或「區域霸權更迭」問題而已。也就是說，究竟當前東亞體系鬆動所彰顯的意義，到底是從日本到中國大陸的核心移轉，還是整個階層性結構的崩潰與重組，應該是未來十年間可繼續追蹤觀察的研究目標。

# Adjustment and Transition of East Asian “Flying-geese” Structure

Tung-Chieh Tasi

##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region, East Asia is not only attention-getting, but attract many scholars to study why those countries could develop so successfully, and what principles they could offer to other countries and even to modify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theory. Anyway, discussing about the “flying-geese hypothesis” is the main focus of it. Especially after the 1990s, because shocks of the Japan’s “Bubble Economy” problem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1997, critiques about the hypothesis also emerging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in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above, in this paper, at first, I will trace the constructing process of the flying-geese theory, then observe furthe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related policies, especially the role of government and its foreign investment strategy. Finally, I will focus on the change and adjustment of regional system, and hope to realize the future of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Keywords:** East Asia, flying-geese structure, Japan, government-led industrialization, financial crisis